

论毛泽东对古田会议的杰出贡献

武志军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毛泽东对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杰出贡献。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中的作用，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田会议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以及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明确指出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起义，走上了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秋收起义后不久，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同年12月，彭德怀等率领湖南平江起义的红五

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红军力量的壮大，引起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恐慌，他们加紧了对井冈山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井冈山的斗争环境变得十分艰苦。1928年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来势凶猛的第三次“会剿”。为了保存红军实力，确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安全，取得最后胜利，红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留在井冈山正面对付敌人的进攻，坚持内线作战；一路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寻找外线作战，以减轻井冈山的压力，并解决困扰红军的经济给养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共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离开井冈山，原本是想“围魏救赵”，把敌人调开后，重返井冈山，但却没有如愿以偿。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刚从井冈山下来就遭到强敌的跟踪追击，遇到了“自有红军以来最大的困难”。为了摆脱敌人，红军每日平均急行军90里以上，沿途连战四次都失利。之后，红军转战在赣南闽西。

由于红军初创，经验不足，兵员成分复杂，尤其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占了较大比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加上中央的“二月来信”^①在红军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党和红军队伍中思想上的混乱。红四军党内和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分歧逐渐暴露出来。在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上，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党对军队管得太多了，党不能管理一切，军队要军官说了算；有的人坚持单纯军事

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对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信中对红四军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作者注）。

观点，认为军队就是打仗，政工人员是部队的累赘。在红四军的政策和策略方面，在官兵关系和军队纪律作风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分歧，引起了毛泽东等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不少干部都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科学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明确指出，这些问题是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归纳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以及“其他腐朽思想”等 14 个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红四军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論从远方到来。毛泽东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必须加以纠正。“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①

毛泽东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强调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第 81 页。

必须加以纠正，成为后来古田会议召开的重要动因。

二、毛泽东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了红军的胜利和革命的前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领导层决心彻底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1929年5月25日，红四军一举解放了永定县。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要不要设立红四军军委的问题，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是要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问题。

中共红四军军委是红四军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时就成立了红四军军委。红四军下了井冈山以后，1929年2月初，红四军前委决定，为了提高效率，暂时撤销军委。至5月下旬，闽西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红四军也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新环境，工作也明显地多了起来，于是决定重新组建红四军的最高党部——红四军临时军委。由中央军事部派来的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本来前委与军委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刘上任后，一味地设法架空前委，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十分不利。

会上，毛泽东明确表明了取消临时军委的观点。他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前委的工作重心仍然在军队，而军队又处于频繁作战和经常转移的状况，这就需要前委给予集中而敏捷的指挥，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而如果插进一个临时军委，不仅机构重叠，而且军委还要限制前委的权利，这是明显的分权思想。而另

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家长制”。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至下半夜，会议无果而终。

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毛泽东对问题的解决却抱以乐观的态度，表现出十足的信心。6月1日，他在湖雷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情况和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红四军党内出现的问题，他写道：“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①。

6月7日，红四军攻占上杭县白砂镇。6月8日，毛泽东在白砂继续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军委机构问题时，毛泽东继续坚持不设军委的观点。会上仍然是两种意见，双方争持不下。会议期间，性格刚强、坚持原则的毛泽东忍无可忍，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的方式，表达自己在原则问题上的绝不妥协。他写道：“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②。会议最后采取了投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通过了不设军委的决定。但是，红四军中的争论并没有就此消除，反而更加激烈。在此期间，毛泽东又一次表达了辞职的愿望，他表示：“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来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当然，毛泽东也表示：“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7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

不参加这种斗争’^①。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不正确。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奉命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7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期间，7月底，朱德、陈毅去找正在上杭养病的毛泽东协商粉碎敌人“会剿”的退敌之策。同时他们商量决定遵照中央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的指示，由陈毅去上海汇报工作。这时陈毅要求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拒绝了陈毅的要求，他说：“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作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1页。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2—203页。

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① 9月下旬，朱德在红四军党的八大召开之前，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他能参加会议，毛泽东也拒绝了。毛泽东回信说：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② 表明了毛泽东坚持原则，反对调和的立场。

毛泽东与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三、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调查研究、勇敢探索，为古田会议胜利召开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对红四军七大提出了批评。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③。政治局决定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并决定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

转引自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年1月版，第216—217页。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8月版，第204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第285页。

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并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11月下旬，毛泽东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随即从地方回到红四军，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红四军的一般情况，认为红四军此时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必定难以执行党的政策，会议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并决定12月份的主要工作是：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为了开好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11月底，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福建长汀城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12月初，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带领部队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在新泉，毛泽东同朱德、陈毅领导红军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期间，毛泽东还发动、组织、召开由支队、大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调查了解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调查会采取讨论的方式，启发大家就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毛泽东亲自参加大会的讨论，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这些调查工作，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做了初步的准备。

12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

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继续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导各提案小组经过 10 多天讨论，研究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方法，写出各个提案的草案。联席会议还讨论了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资格等有关问题。规定大会代表须由支部选举产生，每个基层支部一名，党的领导机关适当多一些。规定要有一定数量的青年代表。还酝酿了新的前委候选人名单，提出“要‘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的人才当选”。联席会议结束后，各级党代表回到各单位召开党支部大会，传达联席会议内容，带领全体党员弄清思想，提高认识。与此同时，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的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起草了长达 3 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八个决议草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四、古田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929 年 12 月 28 日、29 日两天，古田会议召开。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 8 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精神，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

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

在党的建设方面，古田会议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是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先进性；二是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三是古田会议还注意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战斗力的重要内容。在军队建设方面，古田会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一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二是重申和发展了“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三是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四是规定了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等等。古田会议决议案提出和阐明的建党建军方针，是建党建军以来党和军队建设的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条件下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成果和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古田会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勇敢的探索精神，已成为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泛滥，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未遇到的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立足党和红军艰苦奋斗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到党和军队的建设中来，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带领全国

人民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处在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面对波澜壮阔的实践，我们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夺取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与实践

罗子俊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毕生对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的贡献之一，是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他被誉为“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①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他都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积极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他奔走呼号，身体力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和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研究周恩来同志抗战时期的统战思想和实践，对于今天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作用。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民族运动在全国逐步发展起来，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还决定

胡耀邦：《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1月5日。

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1936年4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陕北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他又受中央委托，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并参与领导我党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针对蒋介石政府对日政策日趋强硬，1936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最先和最明确地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这一提议被采纳。9月1日，周恩来致信陈立夫、陈果夫，表明中共“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①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周恩来是共产党内“逼蒋抗日”方针的最早提出者，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定后，周恩来又是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他在9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要真正走向抗日，还要从斗争中使之实现。9月22日，他再次致书陈立夫、陈果夫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②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明确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的原则方针，得到中央大多数同志的认同。会后，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西安，代表中国共产党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解决西安事变。按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兄妹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的协议，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周恩来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成了初步的和平局面。毛泽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内时局转变的枢纽”。这是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也是周恩来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不朽功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又担负起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重任。1937年2月，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等人在西安谈判。3月，周恩来应蒋介石邀请到杭州谈判；6月，又到庐山谈判。因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企图“溶化”共产党和肢解“红军”，谈判没有结果。“七七”事变后，周恩来又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从1937年2月至8月，周恩来等同志前后与国民党进行了长达七个月的艰难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忠实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与国民党就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红军改编、边区政府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反复磋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的发展者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在国统区工作，这一时期，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最活跃，成绩最显著的时期。

1937年9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山西抗日前线统一指导党、政、军工作。为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周恩来及时协调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八路军的配合作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胜利，受到了卫立煌的好评，实现了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的密切军事合作。周恩来还积极做阎锡山、傅作义、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方针，鼓励他们坚持华北抗战，这对后来卫立煌、傅作

义的思想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7年12月，周恩来到达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副书记。为进一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以及蒋介石多次进行谈判，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负责共同纲领的起草；扩大国防参议会为国民参政会，广泛吸收各抗日党派、团体参加。除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外，周恩来还花费大量时间，向社会各界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他同冯玉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者在首次与周恩来会面后，感叹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周恩来还对地方实力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滇军龙云，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等，进行了联系工作，为抗战中后期地方实力派与中共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期间，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忘我的工作。他接待大批来访的进步人士，详细地向他们说明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持久战的思想；热情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还对许多外国友人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柯棣华大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热情会见他们，向他们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赞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并派人把他们送到延安。

周恩来还高度重视思想文化界的统一战线。他不仅关怀和具体指导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而且动员和支持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通过第三厅的工作，团结文艺家去发动群众，支持长期抗战。周恩来批评一些人对三厅在统战工作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的错误，他对阳翰笙说：“有些有

清高思想的人，对第三厅的作用是估计不够的，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改革政府组织，政权公开。国民党就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他就要搞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权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国抗战做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①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郭沫若的主持下，第三厅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民众支持抗战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诚的维系者

周恩来指出：“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其所以复杂，是因为作为统战对象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很复杂，具有很明显的两面性。其两面性的体现是：既抗日又反共，而抗日和反共又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作战，有时还同日本人勾勾搭搭。既要反共，又不敢最后破裂。这就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如何处理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便成为十分复杂的问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此时，由于日本政府对国民党政府采取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分化方针和英美等国对日本侵华采取的绥

《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四期。

靖政策，国民党当局由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并先后掀起多次反共高潮。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的进行，身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对国民党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坚决予以回击，争取抗日的国民党势力，推动国民党继续抗战。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进一步强化法西斯专政、限制和取消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周恩来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极其艰难。但周恩来坚持党的“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抗战方针，以自己的言行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真诚，对国民党的抗战行动给与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例如，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在开赴山西时，没有作战地图，当时在山西的周恩来、朱德知道后，立即派人送去地图。周恩来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和战斗力的提高也尽了努力，他派叶剑英等同志帮助国民党在衡山举办抗日游击训练班，并亲自去给学员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讲述了敌、我两方面的政略和战略的发展变化及前途等十三个问题；以坚持抗战的思想武装国民党军人。“皖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逼降国民党，于1941年5月在中条山地带向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国民党军队战败，丧失五万多兵力。蒋介石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予以肯定答复。在蒋军败退的情况下，八路军在北平公路主动出击，断绝交通，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事后，周恩来在致《大公报》的公开信中指出：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永远实践团结抗战。

周恩来对于国民党，不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也注意到他们的反动性。1940年10月，何、白“皓电”发表后，国共